

# 仿生水盂 文房雅物

◆ 李笙清

公元1793年,清乾隆皇帝御笔题写《咏钧窑水盂》:“修内遗来六百年,喜他脆器尚完全。况非碧玉不入市,却是清真可设筵。讵必古时无碗制,由来君道重孟圆。细纹如拟冰之裂,在玉壶中可并肩。”乾隆皇帝颇具艺术造诣,诗词书画无一不精,这首诗便是专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钧窑所制水盂而作。

水盂又名水丞、水盛,因多为钵盂形制得名,是古人书房的重要辅助用具,亦是文房清供之选。它常配有取水小勺,主要用于盛水研墨。南宋龙大渊《古玉图谱·文房部》记载:“水丞,贮研水的小盂。亦名‘水中丞’。”武汉博物馆藏有多件古代水盂,材质各异,雅致小巧。部分器物被塑造成动物仿生造型,憨态可掬,惟妙惟肖,寄托着古人的美好愿景,也让今人得以窥见水盂在古代文房中的雅致风貌。

三国鸟形青瓷水盂,高4.2厘米,口径8.6厘米,底径4.8厘米。青瓷以铁为着色剂施釉,经还原焰烧制而成。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时期,浙江、江苏、安徽等地瓷器均以青瓷为主流。水盂最早出现于东汉,这一时期墓葬中多有出土,可见当时已较为流行,且以陶瓷质地为多。明代文震亨《长物志》有言:“铜性猛,贮水久则毒,易脆笔,故必以陶者为佳……”这件青瓷水盂为仿生鸟形,器身刻画双翅展开的飞鸟纹样,鸟头高出水盂口沿,弯嘴尖喙,目视前方,形神兼备。明代高濂《遵生八笺》称水盂“但口敞可以贮水者”,此盂鼓腹三足,口沿宽大,恰便于取水研墨。

西晋青瓷蛙形水盂,高3.5厘米,口径4.1厘米。器型圆口鼓腹,圈足外撇。腹上部至口沿堆塑青蛙、水波与水草纹饰,青蛙昂首阔嘴,凸睛有神,蛙身与器身浑然一体,背部挖空贮水,前后腿巧妙堆塑于两侧,形象生动,极具立体感。青蛙常栖于河塘沟渠,以蛙为原型的水盂,既凸显蛙与水的紧密关联,也为书斋增添生趣。两晋蛙形水盂留存颇多,这类仿生文房用具,体现了匠人对青蛙形态的细致观察与精湛技艺,也反映了彼时的社会风貌与文人情趣。

辽三彩鸭形水盂,高6.7厘



■ 鸟形青瓷水盂(三国)



■ 青瓷蛙形水盂(西晋)



■ 三彩鸭形水盂(辽)



■ 黄玉蟾蜍形水盂(明代)



■ 炉钧釉蟹形瓷水盂(清代)

型,辅以刻、划、剔、彩绘等手法,纹理细腻,栩栩如生。器物通体施黄、绿、白三色釉彩,呈色明艳光洁。辽朝建于公元907年,国号契丹,立国早于北宋数十年。辽三彩受唐三彩影响颇深,又兼具契丹民族风格,这件鸭形水盂形制别致,构思奇巧,堪称辽三彩文房佳作。

明黄玉蟾蜍形水盂,高4.5厘米,宽8厘米,口径2.9厘米。器物以整块黄玉碾雕而成,仿蟾蜍造型,背部挖空敞口以盛水。蟾蜍趴伏在地,四肢蜷曲,头部微仰,双目突出,周身布满金钱状疙瘩。蟾蜍在古代被视为辟邪纳福的祥瑞之物,寄托着“财源兴盛”“蟾宫折桂”等美好寓意,民间亦有“蟾蜍望月”“刘海戏金蟾”等传说。玉质水盂向来造型丰富、工艺精美,这件蟾蜍水盂集圆雕、镂雕、浅浮雕、线刻等工艺于一体,玉质温润,尽显匠人巧思。

清炉钧釉蟹形瓷水盂,高4厘米,宽8厘米,口径3厘米。明清时期,蟹形水盂深受文人雅士青睐,相关品评与诗词不胜枚举,乾隆皇帝亦曾御笔题诗赞誉。《明史·选举志》记载:“会试第一为会元,二甲第一为传胪。”清代厉荃《事物异名录》云:“蟹之大者曰蝤蛑,名黄甲。”因芦苇的“芦”与“胪”谐音,古人以双蟹衔芦苇寓意“二甲传胪”,为蟹形水盂赋予科举高中的愿景。炉钧釉创烧于清雍正年间,仿宋代钧窑釉色低温烧制而成。这件蟹形水盂釉色浓艳匀净,器型规整,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。

宋代赵希鹄《洞天清禄集》有言:“晨起则磨墨,汁盈砚池,以供一日用,墨尽复磨,故有水盂。”水盂既能贮存研墨清水,也可调节墨汁浓度。明代高濂《遵生八笺》列举的书房必备陈设中,水盂赫然在列。在品类繁多的水盂中,仿生动物造型者尤为出类拔萃,它们小巧玲珑,赏心悦目,被文物专家誉为“文房第五宝”。水盂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,深受古代文士喜爱,他们不仅朝夕相伴,更以“丞兄”“丞友”相称,寄托情感与志向。部分文人还会定制水盂,刻画铭文作为收藏或馈赠之礼,尽显别具一格的审美情趣。

## 砚上喜蛛 静里藏春

◆ 姜连生

笔者的收藏中有一方端砚,长20.5厘米、宽13厘米、厚3厘米。砚面以整雕技法塑造出一只布局构思颇为精巧的大蜘蛛:前两足自然舒展,围合成两个小水池;头部平整可作笔舔,硕大蛛身直接作为研墨砚堂;左右三足顺势弯曲,与砚边形成狭长水塘,巧妙实现功能与造型的统一。砚背阴刻“已静惟用”“缶用”两行铭文,字迹遒劲,尽显金石气息。

“已静惟用”是古代文人的心境追求与处世智慧:“已静”指通过修养抵达内心平和澄澈之境,“惟用”强调在宁静中发挥事物本质价值。明代万安县出土的一方端砚,便刻有13字秦篆“端溪湿润石,已静惟用是以延年”。



■ 蜘蛛纹端砚

砚面的蜘蛛雕刻亦颇具讲究。在传统民俗文化中,蜘蛛被

尊为“喜蛛”,在早晨、中午、晚上见到它,有着不同的吉祥寓意:清晨见之预示喜事临门,如金榜题名、家庭添丁,若见蛛丝垂落,更象征“喜从天降”;正午现身兆示贵客来访,恰应“正晌午有客来”的民间俗语;夜晚现身则代表财运降临,“蜘蛛吊,财神到”的说法即源于此。七夕等特殊时节,喜蛛织网更被视为“织女赐福”,既象征美好姻缘,也寓意心灵手巧。这些文化内涵根植于传统积淀,《西京杂记》中“蜘蛛集而百事喜”的记载、唐代“喜虫天降”的传说,皆可为证。

一方端砚,集雕刻之巧、铭文之智、民俗之韵于一身,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堪称文人雅器中的珍品。



■ 辽三彩釉鱼形注壶

对于收藏爱好者来说,“唐三彩”可谓耳熟能详,但提及“辽三彩”,知晓者恐怕寥寥无几。事实上,辽三彩与唐三彩齐名,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重要地位。

公元916年,辽政权在我国北方建立。这个政权吸纳中原文化精髓,创造出一系列极具特色的器具,辽瓷(陶)便是其中之一。受当时材料与工艺的限制,辽代烧制的各类陶器均为低温彩色釉陶制品。这些器物多以黄、绿、褐三色施釉,且传承了唐三彩的传统技法,因此被史学界与考古界命名为“辽三彩”。

辽三彩的最早烧制年代,目前国内尚无确切证据可考。不过,从带有明确纪年的墓葬出土器物来看,辽穆宗之前就已有黄、绿单色釉陶器问世。辽三彩承袭唐代传统,属于受唐三彩影响发展而来的低温瓷质釉陶,胎质粗而偏硬,呈灰黄白色或淡红色。

尽管同属三彩釉陶,辽三彩与唐三彩却有着明显区别:二者胎土不同;唐三彩釉色含蓝色,辽三彩则无此色调;辽三彩施釉缺乏交融感,釉面少了斑驳华丽的韵味,这些正是唐三彩的优势所在。

相较于唐三彩,辽三彩有着四大

独特之处:一是民族特色鲜明,器型普遍偏小,常见穿带壶、鸡冠壶、海棠式长盘等,纹饰造型洋溢游牧民族气息,颇具特色;二是实用功能突出,多为日常生活用具,马蹬壶、印花扁壶等器型便于携带迁徙;三是艺术风格独特,烧制技艺独树一帜,釉色斑斓鲜艳,纹饰采用划花、印花、贴花技法,以花草虫鱼纹为主,工艺精湛;四是创新精神显著,造型突破前朝体例,尽显粗犷豪放的特质,器物多带鼓钉纹、双系等装饰,更显美观厚重。

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辽三彩釉鱼形注壶,是辽三彩中的重量级精品。这件注壶高15厘米,口径5厘米,底径7厘米,整体呈鱼形,鱼嘴为壶流,背部设喇叭状菊花形注口,一侧置提梁。鱼腹下饰荷叶托举器身,通体施黄、绿、白三色釉彩。整器造型饱满生动,鱼儿摇首摆尾,一派悠然自得之态,集模印、贴花、堆塑、刻划工艺于一体,制作难度极大。

长期以来,收藏唐三彩者众多,收藏辽三彩者少。令人欣慰的是,国内许多专业文博机构已相继推出辽三彩专项展览,相信凭借鲜明的时代特色与珍贵的史料价值,辽三彩必将获得更多鉴赏者的青睐。

## 铜雕·双提篮女孩

◆ 原野

2002年岁末,外滩源工程正处于改造阶段,上海友谊商店接连开展清仓活动。彼时我在外滩23号工作,趁午休等时机几番前往觅宝,最终觅得这款《双提篮女孩》铜雕摆件。

这款铜雕连底座高27厘米,底座直径11厘米,是一件复制品,原作出自法国雕塑大师奥古斯特·莫罗之手。莫罗出身顶尖雕塑世家,父亲与兄弟皆是法国知名雕塑家。他尤擅塑造女性人物与小天使造型,诸多作品现珍藏于欧洲知名艺术机构。

这件青铜雕塑是莫罗孩童主题的代表作。女孩身体线条流畅、比例完美,四肢动作与肌肉起伏,生动传递出提篮的重量感,双脚微张,仿佛正迈着欢快步伐前行。她双手各提一只大篮子,篮中空空如也,却是塑造人物形象的点睛之笔。这两只篮子,承载着她的生活小世界,也盛满未知的惊喜与可能,让人不由得联想:她许是刚从集市归来,篮子虽空,却装下了一路的好奇与憧憬。

她的身体微微倾斜,并非刻意,而是自然流露的动态感,仿佛下一秒就会因新奇发现驻足。头部随之转动,目光灵动好奇,像是回应伙伴呼唤,又或是被路边小花吸引。创作者精准地捕捉了这一瞬间,将女孩的天真活泼凝固在青铜之上,让观者仿佛能穿越时空,走进满是童趣的世界。

女孩的发型也是作品的亮点,发丝根根分明,似在微风中轻扬。纹理时而微卷、时而顺滑,尽显莫罗对质感的精准把控。女孩手中的篮子同样雕刻精细,篮子表面的编织纹路清



■ 铜雕·双提篮女孩

晰流畅,提手圆润光滑,让人仿佛能感受到提篮时的舒适触感。

青铜深沉厚重的色泽,与女孩纯真形象形成奇妙对比。青铜象征岁月沉淀,女孩代表新生希望,这种对比让作品更具张力,尽显超越时间的永恒之美。她唇边浅笑如暖阳,唤起人们对童年无忧无虑时光的回忆,无论老者还是少年,都能从中找到共鸣。

在喧嚣浮躁的现代社会,这件作品恰似一股清泉,滋润着人们的心灵。它不仅是一件艺术佳作,更是一份情感寄托,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奥古斯特·莫罗的这件《铜雕·双提篮女孩》以灵动姿态、细腻刻画与深刻内涵,成为雕塑艺术史上的经典,永远散发着跨越时光的纯真魅力。

辽彩千年韵自浓

钱国宏